■讲 述

曼谷老人

□周李立

一

在这40多年里的很多个炎热的午后，老人都是这样独自坐在曼谷家中别墅的楠木椅上，一边承受着来自暹罗湾的潮热海风，一边听着DVD播放的京剧或者昆曲，有时兴起，老人也听听邓丽君。

在软滑的泰语世界里，生硬的京腔、拖沓的昆曲以及甜腻的邓丽君都显得异常独特。声音在此时此地，是一条特别的航道，老人由此始航，滑入早就虚无的回忆之洋。

老人最近开始喜欢听李玉刚，一遍一遍播放着李玉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《游龙戏凤》演唱会的DVD。这位经由央视星光大道选秀出道的歌手，酷似京剧梅派的路数——唱念做打无不是女人模样，一人分身还可男女对唱。中国艺术的虚幻之美在李玉刚或梅派这里被夸大呈现，欣赏者往往需倾注一些想象力，才能填补艺术与现实认知之间那段长长的距离。

老人说，“这比泰国人妖美。”

在老人这里，李玉刚是女人声男儿身，人妖恰与此相反。声与身虽不可分，如虚与实总是相互裹挟，然而，无形的声音却终能更直接地砸中记忆，窜入内心每一寸空隙，无可逃遁。而有形的肉身，无论身处何地是何形状，也总是轻飘，承不住回忆。

二

老人今年69岁，离开湖南老家47年，最后一次回湖南是40多年以前。中间漫长的时光，经由声音的路径，盘根错节地搅合在一起，老人一直深陷其中，竟然仿佛从未离开一样。

老人仍然顽固地讲着带有湖南衡阳口音的国语。40余年在泰国商场征战的经历，也没有让老人学会黏稠的泰国话。至今老人一出口仍然是硬邦邦的衡阳普通话，中国人难听懂，泰国人更不懂。语言设置起一道天然的保护层，又总是像贝壳一般收拢，保护着“乡音无改鬓毛衰”的游子心情。在这把语言的保护伞下，只站着一个孤独的人。他孤独的原因显而易见：回不去也不愿回去的故乡；无法沟通的当下；语言的日常使用已经困难，更莫说精神的交流；老去的年华；不得不放下的生意；奔忙的儿女。时间让一切如鲠在喉的客居心情，都软化顺滑。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，只能将这命运赐予的鱼骨咽下。

老人不愿再回湖南，说是受了故乡的伤。1966年在衡阳祁东县的农村里，赶着春忙天天采摘黄花菜的少年，每天抬头看见的，却不是那些总也采摘不尽的黄花，而是长江尽头处那座梦幻般的海上之城。

少年那时已经当了两年的农民。在两年之前，他的身份是大学生。从农民变成大学生容易，再从大学生变为农民却没那么容易。1962年，考入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湖南乡下少年，让天之骄子的光环光耀了家族门楣，也刺激了满怀妒意的同乡。一纸告状信在那个年代有着改变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命运的力量。一桩欲加之罪在特殊年代的紧张气氛中，让同济大学对少年作出了开除学籍的决定。失去大学生身份的少年，只得逆长江而上，回乡之路此时道阻且长，少年也从此开启一生逆水行舟的生涯。

那两年务农的日子或许有些艰难，不然为何40多年之后，老人仍然决绝地逃避着回湖南。不过有时回想起来，其实也还好，湖广大地鱼米之乡，农耕渔牧四时皆有可忙。其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已过、“文革”尚未开始之时，一切并非惨不忍睹。少年是家中长子，弟妹5个排成一队，看起来家族在村里也是有些阵势的。但怪只怪，那颗在上海见惯了江河湖海的心，再也无法于三湘四水中安定，它骚动慌乱，一刻不停。

不知道少年如何下定了出走的决心。但想必与天下所有离家出走的少年一样，那只有年少轻狂才有的说走就走的勇气起了莫大的作用。

第一次出走，走的是传统的离乡背井之路。从湖南到广东，像历史上的那些客家人一样，南迁，远离中原的繁文缛节和沉重。岭南的瘴气仿佛总是能够遮蔽掉千疮百孔的过往，给异乡人一个崭新的面貌，用来重新开始。

少年果然只用了几个月便重新开始了。他把派出所给他遣返还乡的车票与别人交换，换来一张去广东的车票，然后以同济大学高才生的底子，找到了饭碗，足以养活自己。

还是怪那颗心，蠢蠢欲动，对故土亲人念念不忘。不久，少年忙不迭地回了趟衡阳老家，却又一次被故乡中伤，但凡伤害，似乎总是来自你爱的人和土地。从县上来的公安们，站在村里的地坪上，扎眼得很。于是村里人就都知道了，前两年被学校开除的“反革命少年”，最近又出逃了，但很快又被抓回来了，准备接受调查……

三

若干年之后，老人发现自己在同济大学两年所学的与建筑有关的知识全部忘光，却从内心里无端生出了一种对房子的热爱。年老之后赋闲在家，无事时便折腾房子以打发寂寞的时光。今年就先把曼谷的别墅里外都粉刷了一遍，金棕色的外立面让老人的家在一排白色小洋楼中格外醒目，车开进来一眼便能看到，像一排牙齿中镶了颗金牙。在老人的小儿子看来，父亲的房子有一种“奇怪的颜色”。

曼谷本就是一座金光四射的城市，金光多来自那些佛教寺庙和皇家宫殿。但在曼谷金融街附近的别墅区里，却有一位中国老人也住在金色的房子里，老人自己做自己的佛、自己的王。“迪拜，迪拜的房子都是这个颜色的。”老人自豪地解释着，很满意自己的品位。老人一生数次去过迪拜，那是全世界有实力的珠宝商人都爱去的地方，经营珠宝40余年的老人怎能例外？想必迪拜这座奢华之都，必定有着金光灿烂的外貌。“这是沙滩的颜色。”但老人随即又纠正了我们错误的猜想。

除了曼谷市区的住所，老人在距离曼谷60公里外的班绳以及100公里外的芭提雅也各有房产。尤其班绳的海边别墅，给老人带来莫大的乐趣，因为这里的房屋业主可以自行设计建造。老人很满意这种对房子的自主权。他带着一种创造性的心情，用60余种不同的树把房子包围起来。老人如客家人给自己建围屋一般，将居所与环境隔绝了起来。老人还喜欢参观周边邻居们的房子，如建筑专家般点评各家设计优劣。点评时，自己的房子总是他用来比照的一处模板。那些被点评的邻居们，多数也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侨民，他们永远不会知道，这位对他们的房子指手画脚的中国老人，曾有过机会成为一名建筑师。

在班绳树木掩藏的别墅客厅，老人可以大大地打开落地的门和窗，听凭炎热的风穿堂而过，却带不来一丝清凉。这片曼谷郊区的别墅，平日里异常寂静，老人躺坐在硬硬的楠木躺椅上，一边翻看着近年来陆续从中国大陆、香港和台湾带回的中文书，一边想着还要对房子做些什么样的改造。这片土地总是炎热得很，四季蝉鸣，是老人一直可以听到的声音。

老人看的书多是西方哲学。叔本华、尼采、佛洛伊德都是老人书架上的座上宾，简繁体版、横竖排版、香港版、台湾版一应俱全。一生与金银珠宝打交道，精神上也不能亏待自己。冒险是必要的生存养分，精神上的冒险便只能求助于哲学了。

对高峰体验的痴迷，让老人一生几乎都没什么可以交心的朋友。想要在泰国找到一个能听懂湖南普通话的中国人本就困难，更何况还需对方能懂得些叔本华和尼采。这简直比珠宝玉石更加奢侈。于是老人只能自己读，一个人读，拿圆珠笔做做笔记，这就算是一种交流了。

读完了便要去买书，在泰国难买到汉语书，更何况还不要畅销书，而要哲学书。于是老人每年都到中国“补货”。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、贵州、重庆、四川等都是老人常去的地方，却不再到湖南，哪怕湖南与重庆、贵州也仅仅一水之隔，也就让它永远隔着。

“补货”第一是买书，第二是买茶。老人的大茶杯里，永远装着产自中国各地的茶。老人一边喝，一边念叨今天喝的是贵州雷山的茶，昨天喝的是云南西双版纳的茶，仿佛产地比茶本身更加重要，更加值得被记住。

却也不仅仅需要茶，曼谷老人的生活必需品中还有咖啡。几十年来在异乡游历，落下对咖啡的瘾。早晨开车出去，第一件事是寻找对口味的咖啡，老人用带着湖南口音的英文熟稔地对咖啡店服务生下单，拿铁、摩卡之类都不入眼，只要一种产自南美的黑咖啡。

对茶和咖啡的瘾在老人身上轮流发作，就像东西方世界的符咒贴到一起。老人受制于它们，对它们的依赖也让他更加脆弱。因为他总是在长途旅行的途中念念不忘一杯可口的铁观音或黑咖啡，这让他的旅行时常偏离轨道。

但旅行却仍然比茶和咖啡都要重要。老人有一辆里程已达50万公里的奔驰车，他用了20年时间来完成这个计数，平均每天100公里。如今这辆超龄服役的奔驰车只能擦得亮亮的成为别墅的一种装点。

然而小小的泰国一隅已无法满足老人旅行的需要。美洲、欧洲和亚洲，老人四处溜达，凭借一点点英文和一口湖南普通话。来得最多的还是中国，每年到中国“补货”，老人惯常独来独往，守着售票处出廉价机票，哪里便宜就去哪里。儿女有心作陪，也吃不了老人旅行时喜欢的那种苦，住青年旅社，长途徒步，脚都要走出泡来。老人尤其热衷在中国西南边陲的山间林地徘徊，这也许是40多年前从中缅边境山林非法出境的秘密往事在作祟。

四

老人出境时带了3袋奶粉。3袋奶粉支撑他走了3天，从云南走到了缅甸。那是1966年年底，他当时22岁。第一次南下广东的失败经历加之当时国内的环境，让老人无端觉得自己的未来只能在国境之外。

当然整个过程也许要复杂和惊险一些，比如：60年代的深山老林，应该还有各种野兽出没；缅甸当时仍有不少的国民党军队残留势力；金三角地区的危险混乱；比比皆是的占山为王的土匪……不过往事皆不可追，老人无心回忆，后辈也无处查对。可确定的仅仅是老人用3袋奶粉走过了密林。说走过也有些牵强，事实上老人随即就遇见了土匪并入伙，也由此成为流窜在边境的一名土匪。大学生的资历让他深受土匪头子器重，原来土匪也需要有文化人来帮他们写写画画。如今回想，老人只说他们杀人不眨眼。大难不死，以待后福。

后福没等来，却等来3年的牢狱之灾——因为非法入境。但焉知非福，任何国家任何时代，监狱总是黑暗势力的汇集地，3年牢狱馈赠给老人的礼物，便是摸清了缅甸的势力地图，从此知道何处是雷区何处是坦途。依靠这绝境逢生的网，老人涉足珠宝生意，由此发家。当然，这中间曾数度破产，生意亦并非一片光明。

但生意是老人一生的信仰。那自青年时候养成的对生意的敏感与判断，到老来也成为老人的困扰，像巧妇突然失去了厨房，技痒难忍。如今69岁的老人已放下生意，三个儿女又各自有事业无需插手，满腹经纶的书生无处施展才华，老人每天摩拳擦掌，又每天无事可做。喝茶读书旅行其实都只是无奈的打发时间的方式。曼谷老人需要的是生意，在生意中感知、判断与决策的过程，才是他真正乐此不疲的高峰体验。他是吃惯了“老干妈”的湖南人，该如何习惯生活清淡得如白水青菜？好在老人四处走来走去有时也会发现些许商机，便赶忙回去告诉儿女。大儿子与大女儿各自经营珠宝生意，小儿子在银行工作，三姐弟有时会顺着老人提供的商机做一些投资，但都知道比投资更重要的，是老人发现自己老有所用之后的满足心情。惟一能与这心情媲美的，便只剩下儿女们回家探望时刻的满足感了。儿女们又有了儿女，站在一起也是浩浩荡荡的一排人。当初老人单身闯边关，如今落地生根、开枝散叶，也不过数十年之间的事情。儿女们还能讲简单的中文，到孙子一代就完全不通中文了。老人与孙子之间的交流，只能通过太太完成。

太太是老人一生的宝，是老人与泰国这块异乡之地交流的一扇窗。缅甸出生的太太不仅拥有纯正的中国血统，而且能讲标准普通话以及缅甸语、泰语、英语等若干门语言。太太在语言上的天赋让她天然地就能理解老人含混着湖南话、普通话以及英语的表达，她是老人在这个世界上交流无障碍的人，惟一的。原来上帝眷顾老人的特殊方式，便是给他一位知言善辩的太太，于是老人回想一生经受，都不说苦。

五

纵横曼谷城区的高架桥，层层叠叠，穿行其上，发现与上海或广州的市景也并无太多不同，甚至它们还都有一条拥城而过的河。每当夜晚，天气晴好，星月映霓虹，那河上便会开行游船，景象与黄浦江或珠江夜景，亦如出一辙。深色皮肤、小个子、五官突出的泰国人，总是比中国人要喧闹一些。炎热的白天他们躲在阴凉处昏昏欲睡，及至夜晚，便唱歌跳舞，精神百倍。

潮热的亚热带气候，让从北方初来曼谷的游客一整天都心烦意乱，白日若梦般恍惚。只是曼谷老人这一场白日梦，做了40余年。百年来下南洋的华人并不少，但仍以群聚，潮汕人占其大半天下，潮汕话才是进入这片天下的钥匙。曼谷老人这般独步其间的个案，如同撒落盘外的豆子，被命运抛向不知所踪的半空，再无着落。半生经营的家业事业乃至钻营争取的泰国国籍，也只是让后辈能有处扎根，而曼谷老人自己的根，却早已镜花水月，终成虚拟。老人的弟妹5人近年轮流从中国大陆来曼谷探望，白发相对，惟有眉眼间那些相似之处在宣告血脉基因里共同的遗传，言谈气息却均已陌生，寒暄喟叹之后，便只好相顾无言。弟妹们来了又走，曼谷老人仍然独自应付生活的日夜，依赖京剧与昆曲进入岁月的混沌，隔绝而封闭。一如老人一生都顽固地抗拒使用手机，那带有信号的小金属盒子是通往外部世界的信道，这信道着了魔法一般，束缚住自由的灵魂。曼谷老人说，他不需要。

■人 物

梦萦大亮山

□李培禹

大亮山在哪儿？在云南保山施甸县境内。为何叫“亮”山？因为它秃，光秃秃的，一片荒凉。

20多年前，一位从地委书记位子上退下来的老人，在这里搭下窝棚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挖坑、种树、浇水、护林，一直干到22个年头后的一个秋天，他再也干不动了，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这位老人叫杨善洲。

两年前，一个演员来到这里，要把老人的事迹搬上银幕。他说：“刚接戏那会儿，我对这个人物的真实性还有怀疑，世界上真的有这样无私的人吗？可到了保山后亲眼一看，我为我心里有个问号而感到内疚，说得夸张点，有些羞耻。我上了大亮山的林场，看到过去曾经是光秃秃的一片山，现在变成了一望无际的大林海。这森林不是假的，是这个老爷子退休后带了一帮子人，在山里20多年干出来的。”于是，他钻进了杨善洲的生活，翻山越岭重走杨善洲的路，连续几个月住在杨善洲的床上，还借来杨善洲的衣服、帽子、布鞋、油灯、拐杖，整天穿着、拿着找感觉。他说他的灵魂得到了一次净化，成了杨善洲的“粉丝”。这个演员是李雪健。

电影拍完进入后期制作，有人说，这片子能获奖。李雪健说：“如果得奖，我要把奖杯捐给老爷子。”他把这个念头说给朋友们听时，谁都没在意。凭他李雪健，拍电影得个奖，捐个奖杯，不算什么吧。

谁知，这是他内心的一个承诺！

电影《杨善洲》获奖了，像以往，一次创作完成，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可这次不同，大亮山上那个远去的老爷子的身影，还牵着他的心。他，未见轻松，心里搁着事。

电影《杨善洲》很容易使人联想到《焦裕禄》。不仅因为这两部影片有着类似的主题，而且因为它们是李雪健演艺生涯中的两座丰碑。1990年，《焦裕禄》使李雪健迎来了演艺事业的第一个高峰，斩获了当年的中国电影金鸡奖和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主角奖。在21年后，李雪健再度通过他精彩的表演，使观众记住了另一位人民的好书记——杨善洲。

然而，20余年过去了，很多东西发生了改变。两部影片上映之后的不同遭遇，令李雪健感慨不已：“去年6月30日，《杨善洲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映。7月19日，全国公映，我当时在昆明。云南观众的热烈反应使我很兴奋。可北京一家影院，8个放映室，当天只有一个放映室在午饭时间安排了一场放映，全场只有两个观众，其中有一个是我爱人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一宿没睡着觉。一盆冷水泼得我浑身发凉。回到北京两三天后，我又接到儿子的电话，告诉我，另一家影院在晚上七点半安排了一场，比7月19日那天好了一些，有3个观众，其中有一人是我儿子。同期上映的《变形金刚3》，当天票房过亿！为什么？我便去看看一天票房过亿的电影是什么样的。看完后，有人问我感受。我说，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不夸自己啊，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，所谓寓教于乐。《变形金刚》不就是美国先进武器的广告嘛！‘广告片’票房一天就上亿。我蒙了，也不懂。后来，《杨善洲》票房也过亿了。凡是看过的人，给的掌声还是很多的。我的一个朋友，带着孩子去看，看完后，他发了一条信息给我，说孩子流泪了。我看到这个信息之后特别高兴，给他回信息说：我给你发信息的时候，我也流泪了。我得到了安慰，得到了鼓舞！”

“相似的人物和电影，为什么会有如此天壤之别？是时代不同了，观念不同了，还是什么？我觉得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都需要思考。”李雪健说他仍然没有想清楚。不过，让他欣慰的是，年轻观众对于这部影片的接受和认可。在第十九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，他凭借《杨善洲》荣获最佳男演员奖。“我儿子说过，我这样的演员在年轻人中‘人气不旺’，但我上台领奖时，同学们的掌声给了我极大的鼓舞。我说，这个掌声不是给我的，是给老爷子的，是对杨善洲这个人物的认可和热爱。”

也许是回应李雪健的一片赤诚，电影《杨善洲》继在大学生电影节上获奖后，又先后夺得了中国电影“华表奖”、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贡献者奖和北京影视界的最高奖“春燕杯”奖。

前些天，我接到李雪健打来的电话，听得出他有点兴奋。原来，他心里装着的那个笃实的念头，马上就要实现了。云南保山的杨善洲事迹陈列室就要落成了，他将重返大亮山再去看望“老爷子”，他要把捐赠给陈列室的4座金灿灿的奖杯，亲手安放在他心中永远的楷模——“老爷子”杨善洲的灵前！

10月10日，是杨善洲逝世3周年的忌日，也是杨善洲事迹陈列室建成开展的日子，我有幸随李雪健重返云南保山。飞机从北京经转昆明降落在保山机场后，我们一路奔波，沿施甸河溯源而上，两岸格桑花开得正旺，李雪健心情大好。到达林场后，我们换乘越野车终于攀上大亮山顶。极目远望，林海绵延，郁郁葱葱，令人感佩。

李雪健在杨善洲的塑像前伫立凝思良久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老爷子，我来看你了。”由于赶路急，我们没有带鲜花来。真巧，在我们之前到来的几个参观者一下认出了李雪健，十分惊喜。他们刚刚把一个大花篮放在墓碑前，一位抱着女儿的年轻妈妈就把自己手中的一束金黄色的菊花递给他，大家一起深情地缅怀老人家。此情此景，令人动容。

在捐赠奖杯仪式上，施甸县女县长张云怡郑重地一一接过奖杯后要退下，李雪健忽然说：“张县长，你先别走。”县长一愣，大家也有点愣。李雪健从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，说：“我还有件小事要托付给你。这是我拍《杨善洲》得的奖金，我也带来了，我托你把它转交给他的大女儿杨惠菊。逢年过节，清明到了，让她替我给老爷子扫扫墓、献把花吧。”我见到主持仪式的保山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蔺斯鹰，在悄悄地擦拭眼泪……

其实，还有一个细节大概只有我知道：电影《杨善洲》获得的奖项，不止那4座奖杯，它还获得了中国电影“百花奖”的提名奖。出门前收拾奖杯时，李雪健说：“提名奖，有点遗憾，就不拿了吧。”可他却把因提名奖得到的1万元奖金也装进了信封，和其他4个奖获得的奖金一起捐给了杨善洲的后人……

终于要和大亮山说再见了，保山市委书记李正阳一早赶来送行。瞧吧，李雪健要带回北京的有杨善洲的大女儿惠菊摘的柿子和存下的核桃；二女儿惠兰亲手酿的葡萄酒、酸茄醋；老三惠琴更是木耳、三七、红茶、蚕豆等大包小包占满了手。人群中，一直默默跟着的年近七旬的林场老场长自学洪，手里备着一瓶矿泉水，一有空隙就赶紧把水举过来：“雪健，喝口水吧。”

我不禁有点恍惚，这是拍电影呢还是生活中啊？

无关紧要。大亮山之行，已是那样深地印在我生命的记忆中了。

■行 走

雅法小城

□赵剑华

在以色列之前，我根本不知道雅法这个城市。

晚上10点从北京机场起飞，抵达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为当地时间凌晨4点，有5个小时的时差。以色列建筑师、诗人渡堂海义务到机场接我们，半夜三更，也只有诗人有这样的情谊和热度。在北京机场，诗人北塔就和我说：“我们凌晨抵达，为了省一天的房费，我们中午12点以后才能入住旅店。这半天时间，我们正好可以到处游玩。大巴租车费我们自己掏，渡堂海免费给我们当导游。用征求大家的意见吗？”我说：“不用，一征求意见七嘴八舌就无法统一了。你是团长，出了国就听团长的，拉到哪去哪。”

机场到雅法不到1小时车程。在车上，我明白了“雅法”和“特拉维夫”的关系：雅法是老城，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，特拉维夫是新城，是现在以色列国家机关所在地，两个相邻的城合并成为一个大城市。

黎明时分，大巴车来到了雅法小城。这个只有两三千人的精致古城，静悄悄地迎接我们。迎接中国诗人的还有西边垂挂着的一弯月亮，这是从东方一路游走过来的那个月亮吗？它的行程也和我们一样，子夜升起，一路朗照，清光无限，黎明抵达吗？月光静静地播洒，我们来了就带着一阵喧嚣，对着五彩的桅樯、古老斑驳的船坞、蔚蓝的地中海贪婪地拍照。小城睡得很死，我们在码头带着惊讶的表情去观赏它，海鸥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发出阵阵对抗的尖叫。

渡堂海在我们尽情拍照的时候，不知从什么地方为我们买来了还热着的面包。我们充满喜悦地吞食着，感受这个以色列人带来的真诚和热情。渡堂海讲述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感。他的母亲上世纪20年代在上海出生，二战期间是上海人民所保护的5万犹太人中的一个，所以对上海人充满了无限的感激之情。在耶路撒冷的家中，渡堂海收藏着不少中国的绘画和器具。他在上海开办了自己的工作室，在上海出版了他的著作《诗建筑》，他试图以诗歌的方式，为阅读者讲述美的建筑结构。渡堂海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色列国家馆的设计者，他把中国的“太极阴阳之说”应用于他的“海之壳”之中，他实现了“要回到他母亲的故乡，完成人生旅程周期”的梦想。渡堂海来往于上海、北京和特拉维夫之间，用他诗人的真诚和热情、建筑家的幻想和严谨架设着中以两国人民友谊的桥梁。

当天，渡堂海拿出了《解放日报》刊发的介绍他母亲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的经历和他现在上海的事业的文章，微笑着说：“1919年我的母亲出生在上海。”从他飘逸的金色长发和真诚可亲的微笑中，我感觉到“诗歌为世界的和平与芬芳”的魅力所在。诗人的心是相通的。

古老的雅法小城醒了。错落有致的两三层小楼，墙是雪白的，尖尖的屋顶是深红的，最高处的钟楼顶上有醒目的十字架，路两旁是碧绿的草地，古老的石头墙上盛开着鲜艳的三角梅，被时间和脚步磨得光滑的石板小路连着一处又一处古老的街巷。美是一服镇定的良药。这些和湛蓝、洁净、辽阔的地中海相衬，再浮躁的心也会宁静下来。这时，海鸥低低地掠过，好像冲着你的镜头而来，如此景象，谁能不沉醉。

这里的街巷是随地势而自然延伸的，没有高楼大厦的恣意和张狂。粗粝的石头根基透着历史的古朴，斑驳甚至有些残破的墙上，绿色的藤蔓自然垂下，花自由地开放着，处处流露出这座小城素雅、沉静的风格。一个中年的晨练者在跑步，赤裸着上身，可看出发达的二头肌，后面跟着一条雪白的大狗，人和狗对我们视而不见，没有恶意也没有热情，我们也不好意思举起相机。城市还没有完全睡醒，我们这些闯入者也不好太放纵。

晨光中，随着老渡旗帜般飘动的长发，我们在雅法的老街巷里自由穿行，处处可见历史的遗迹。那些老房子有文字在石头上镌刻，我们看不懂，标注的数字可能是房子的年代，历史就这样被记录下来，没有刻意地保护，也没有人为地摧残，一些残垣断壁是时间自然的留存，可做文物看待，没有人去拙劣地为了旅游者的目光刻意掩饰，或者涂脂抹粉打造。这是一个城市呈现的内在强大。古老留在普通的一砖一石，不是非要在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中显山露水。那些小小的窗棂上吊着鲜花盛开的花盆，我们从窗外看过去知道，这是制作和销售铁艺、布艺、陶艺、玻璃制品、木石雕刻的个性化的工作室。小巧而千奇百怪的艺术品让我们眼馋，可主人还没有上班，想买是不可能了。

上到这个城市的最高处，钟声响了，有鸽子环绕其间，好像是这个古老的小城的灵魂被唤醒了。这里能看到山脚下的港口以及更远的蓝缎子面似的大海。一位少女牵着漂亮的小狗走过，白色的连衣裙被风轻轻吹起，古老和现代相互映衬。雅法真的很美。

山顶的小广场上有一尊拿破仑的雕像，从老渡的翻译中，我们了解到：这位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除了捍卫法国大革命的成果，在他执政期间还多次对外扩张，形成庞大的帝国体系。在他创造的一系列军事奇迹中，也包括200多年前铁骑踏上这片古老而沉寂的土地。我想知道，这里与拿破仑退位后被流放的地中海上的厄尔巴小岛有多远的距离？海风轻轻吹着，面对远处的蔚蓝，这座塑像能说明什么呢？以色列人对历史的尊重，还是对英雄的崇拜？